

法國和德國學運風雲人物- 科恩本迪

郭石城

六〇年代法國學運潮流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世界各地相繼發生學潮。美國率風氣之先，從一九六二年的「休倫港宣言」開始，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由一九六四年柏克萊大學校園蔓延至全美各大學。德國則是由西柏林自由大學一九六五年一次要求教育改革的抗議行動開始，經一九六六年成立全國性的「國會外反對團體」迅速成長，而於一九六八年到最高潮。意大利也在一九六七年發動全國各大學聯合罷課。在歐洲各國之中法國的學運雖然發展得最晚，但是它造成的聲勢，卻是後來居上，遠如其他各國所能比擬。

當年領導法國學運的靈魂人物正是本文要介紹的柯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柯恩本迪是一九四五年出生在法國的德籍猶太人。學運發生前夕，他正在索邦大學(Sorbonne)設在巴黎郊區的南特分校(Nanterre)人文學院求學。一九六八年三月初旬柯恩本迪帶領一群學生要求學校當局改革教育制度，因而觸怒學校當局，將柯恩本迪為首的六名學生移送巴黎大學校總區懲戒，於是學運行動迅速移動至拉丁區的巴黎大學校本部。五月三日數千名學生在校門外示威，警方以高壓手段逮捕二百多名學生，由於被逮捕的男女學生在監獄中受到不當的拷打和虐待，雙方對立之勢日益升高。五月十日晚間，兩萬多名大學生、中學生和年輕勞工齊集拉丁區，他們以小汽車、築路用的工程車、張貼廣告用的圓柱子、鐵欄杆，以及鋪路用的石塊、磚頭等在拉丁區各處佈建路障，警方則奉令強行拆除。在混戰中，雙方約有百餘人受輕、重傷。

以柯恩本迪為首的學運核心成員當時採取的

策略是：一方面與警方纏鬥，一方面與學校當局談判。在談判前，他們暗地裡與盧森堡廣播電台聯絡，在學校當局完全不知情之下，將他們的電話談判全程播出。中間還發生一個小插曲，當參與談判的教育部長獲悉柯恩本迪也是談判代表之一時，馬上中斷了談話。在他看來，這是抵制柯恩本迪的手段，可是適得其反的，這一行動反而大大提高了柯恩本迪的知名度，從此「紅髮丹尼」的暱稱不脛而走。

經由盧森堡廣播電台的廣播，學運獲得了廣大民眾的同情，在數天之內各行各業紛紛加入罷工行列。到五月底為止，罷工人數估計約有七百五十萬至九百萬人。再加上當時政治人物之間的政爭，法國政府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機。

不受歡迎的人物

五月卅日戴高樂總統宣布解散國民議會，重新舉行大選，並發動卅萬至四十萬人示威。示威群眾高喊：「肅清巴黎大學校園」、「柯恩本迪滾回德國去！」、「柯恩本迪滾回達豪(Dachau)集中營去！」等口號。

事實上，柯恩本迪早已成為不受法國政府歡迎的人物。五月中旬他應邀前往德國參加在西柏林自由大學舉行的一次會議，會議完畢於五月廿二日返抵德法邊境時，法國邊境官員便以「不受歡迎人物」為由拒絕他再入境。消息傳到巴黎，在拉丁區示威的學生和群眾高喊：「我們都是德籍猶太人」以示支援。幾天後他非法潛返巴黎，並躲藏了一段時間。可是學運夥伴們漸漸失去了崇拜明星的興趣，他自己也很識趣，自我解嘲的說：「我畢竟不是碧姬芭杜！」悄悄的離開巴黎

，前往法蘭克福，投入蓄勢待發的德國學運。

在西歐各國之中，德國參加學運的人數最多，勢力龐大，維持的時間也最久。可是它的組織卻非常鬆懈。一九六八年五月卅日大聯合國內閣推出的「緊急狀態法」經國會通過後，學運團體內部開始檢討「國會外反對團體」的功能，會員們不斷討論將來組織應該如何運作？應該由誰來領導？知識份子是否應該放下身段與勞工合作等等。這些問題都不是「烏合之眾」和學運團體所能解決。一九六九年十月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組織小聯合國內閣，布蘭德總理提出的施政報告便成為壓垮學運團體的最後一根稻草。布蘭德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聯邦政府敢於嘗試給予人民更多的民主，並答應進行各種內政改革，改善與東歐鄰國及東德的關係。他的施政報告打動了學運團體核心成員的心，有一部分加入社民黨或其外國組織，少數人則加入自民黨。

一九七〇年三月「國會外反對團體」的核心組織「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簡稱SDS）正式宣告解體，「國會外反對團體」的左傾成員之中大部分發起成立「德國共產黨」（簡稱DKP），最盛時期擁有五萬名黨員，八十年代初期解散，餘眾投入當時剛剛成立的綠黨。其他的成員則成立許許多多的左翼小團體，他們的立場是自由左傾，因為他們不像其他政黨那樣有固定的黨綱，解決問題的時候往往是臨機應變，因此稱為Sponti，這種小團體數以千計分散在各大學，名稱五花八門，人數從數十人至數百人不等，彼此競爭對立。柯恩本迪所屬的左翼小團體名稱是「革命鬥爭」（Revolutionärer Kampf簡稱RK），一九七〇年年初在法蘭克福創立。柯恩本迪早先就曾向德國的學運團體建議，仿照法國學運爭取勞工合作。「革命鬥爭」成立後，他馬上夥同後來的綠黨領袖費歇爾（Joschka Fischer）前往鄰近的汽車工廠「蹲點」，他們發現德國的勞工與法國不同，他們在企業內已有相當多的自主權，而且在國會內已有代表他們的勢力；再說，他們在較早與學運團體接觸的過程中，就曾經領教過學生們的傲慢

。雙方既然沒有合作的可能，柯恩本迪變轉而以霸佔法蘭克福市威斯特恩區的空屋作為首先活動的目標。

反對血腥暴力

法蘭克福市威斯特恩區是環境優雅的住宅區，此區與市中心商業區毗連，由於市中心寸土寸金，而且已經沒有多少空地可以利用，毗連的住宅區便成為商家覬覦的目標，希望在那裡蓋商業大樓。因此，土地投機者伺機而動，許多屋主也待價而沽，許多空屋就在那裡閒置著。柯恩本迪領導的「革命戰鬥」變抓住這個機會宣稱：房屋只屬於住在房子裡的人，空屋成為投機者覬覦的目標，已失去保護財產的意義，霸佔空屋就是針對資本主義式財產支配權和挑戰。這種說法很容易激起一股民眾尤其是威斯特恩區居民的共鳴。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財產權已由過去絕對性或不受限制性支配權轉變成有條件與可限制性的社會義務。換句話說，財產權的行使並非聽任財產所有人任意為之，而必須注意到公共利益。聯邦德國基本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的立法意旨便在這裡。正因為如此，法蘭克福市政當局基本上是同情霸佔空屋者和當地居民示威行動的。除非法院判決屋主勝訴，非得執行不可，通常市政府是能拖延就拖延。即使執行時也是盡量約速警方，不要使事態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霸佔空屋者與警方之間發生多次衝突。柯恩本迪領導的「革命鬥爭」認為與警方衝突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在衝突中成長」的戰略曾被各國學運份子廣泛應用，不過衝突的尺度各自不同，柯恩本迪採取的是有限度的衝突策略，他反對血腥的暴力行為。一九七七年秋天，最激進的左翼團體「赤軍聯」（簡稱RAF）綁架並殺害「雇主聯合會」主席施萊耶（Martin Schleyer），柯恩本迪馬上在他創立的「用石塊鋪成的海灘」（Pflasterstrand）雜誌上敦促其他左傾小團體與「赤軍聯」劃清界線。

回歸體制，實現理想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聯邦德國因為生態及其他社會問題發生一連串的所謂「新社會運動」，一般民眾在每次社會運動中使用的如：遊走法律邊緣、與公權力有限度衝突、善用媒體等等策略，與柯恩本迪使用者如出一轍。綠黨領袖費歇爾回憶當年與他並肩作戰的情況時，稱讚柯恩本迪見多識廣而且足智多謀，自謂從他那裡學習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受益良多。費歇爾與柯恩本迪際遇各不相同，費歇爾於一九八一年

七月加入綠黨，並迅速在黨內成為核心領導人物。一九九八年綠黨與社會民主黨組織聯合內閣，他出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柯恩本迪於一九八四年加入綠黨，一九九四年代表綠黨當選歐洲議會議員，長期在歐洲議會工作。不管他們的際遇如何不同，他們顯然都會一致同意：只有重新回到體制之內，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

(本文作者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目前旅居法國)

恭賀法國在台協會潘柏甫主任榮調

如果您覺得南歐的人比較浪漫、熱情，北歐的人比較莊重、理性，那麼介於兩者之間的法國或許兩者皆而有之吧！

如果這樣的描述太抽象，那麼在潘柏甫主任的身上或許就可具體的發現這種特質。事實上，除了具有歐洲人的思維以外，他又多了一項東方的韻味。這應該與他熱愛亞洲文化有關。

做為一位外交官，潘柏甫主任是忙碌的而多彩的。他畢業於法國著名的巴黎政治學院，曾在台灣師範大學學習中文，夫人出身日本北海道，是他在Sciences Po.的同學。除了法語外，他能說流利的中、英、日、語。他曾在多處法國駐外使館服務，包括東京、曼谷、雪梨及北京等。在台灣，除了蘭嶼，他走遍大小城市；他喜歡台灣的飲食，包括各種水果及小吃，並且盛讚台灣的自然風景以及人民的熱情。據說他的夫人正在撰寫一本有關在台灣的生活筆記！（預定年底在台灣出版），這正是他們愛台灣的具體證明。

時光飛逝，鳳凰花開。潘柏甫主任已經奉調，即將轉換至英國倫敦服務。

新的主任來自紋萊，而潘柏甫主任也將於七月中旬離台。在此預祝他們夫婦一帆風順！



潘柏甫主任參加法國里昂歌劇院芭蕾舞團〈灰姑娘〉首演酒會留影。